



管理学理论的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

孙 博¹, 谭力文²

(1.嘉应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2.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务中利润往往被列为管理的第一视角。管理追求 $1+1>2$ 的效果,其间暗含着一种互动的视角。由利润的视角来透视管理,免不了要以经济为参照系。权力进入商业企业领域,则体现为公司政治和市场政治。“和谐社会的构建”暗示从和谐的视角来考量管理,更多地是选取了社会作为参照的标准。本位主义是与互动相矛盾的管理现象,应对它要求以整个或更大的系统为参照,即系统观。建立在一般均衡之上的经济学分析是管理者重要的日常工具。管理实务中要形成权力上的牵制,不可出现极化—这就要诉诸政治学分析来实现。格局的合理搭配,即“衡平”,是贯穿于管理各个环节的考量依据。为达到“互动”或“他动”的目的,把管理对象放在系统内考察,“系统动力学”就成为了此时的分析工具。

关键词:管理学 视角 参照系 分析工具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2) 01-0052-05

一、字面意义的分析

我们可以首先尝试由字面意义来剖析管理。

(一) 中文字面

管理,顾名思义,既管又理—前者主要强调施加影响,针对人、事、物、财、信息等;后者意为打理、应对,应主要针对客观事件与财物。“管”应是主动性的,“理”更多地是被动而为。只管不理,则接近于官僚机构的高高在上而欠缺机动灵活;只理不管,则又因累于具体事务犹如救火队员而疏于方向性把握。

(二) 英文字面

管理在英文中被翻译为“Management”;经理则被翻译为“manager”。这里“人(man)”一旦具有了一

定的“资历(ager)”,即经验的积累,就可能成为经理人、管理者。这也从某个角度揭示了管理的内在规律—即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纸上谈兵不是名副其实的管理者。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所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就特别强调对成功和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从正面印证了管理应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指导原则^[1]。

二、本文观点

仅从字面来分析“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对“管理”这个浩如烟海的学科对象,有着众说纷纭的理论观点。“大师”间的看法也各不相同,甚至互相抵触:德鲁克强调“管理是一种实践”^[2],西蒙则注重决策的

收稿日期 2012-01-11

作者简介 孙博(1973-),男,河北盐山人,博士,嘉应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嘉应学院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谭力文(1948-),男,四川成都人,武汉大学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科学制定^[3]；爱迪思由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管理^[4]，巴纳德则从组织职能的角度切入^[5]……合卷静思，管理学究竟有几多奥妙？作者得出了如下一些浅见。为便于理解，不妨先以图表示意（表1）——其实本身也并不复杂。

表1 管理学理论的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

视角	参照系	分析工具
利润	经济	经济学、数理方法
权力	政治	制衡
和谐	社会	衡平
互动	系统	动力学、激励

（来源 孙博，2009）

三、视角

尽管管理或管理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本文还是尝试着给出一些个人的观点。

（一）利润

这里把利润列为管理的第一视角，相信在若干专家的反对声中会赢得大多数公众的支持。因为毕竟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两个衣衫褴褛的醉鬼在街心公园一个对另一个感慨：“我的顾问提醒我要注意授权。”——这样的场景想必必要受到嗤笑，或者甚至连如此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经济利益往往是左右管理力度的首位因素。在和平社会，追求金钱利益无可厚非——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也正是富国安邦的第一要务。研发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无非是为了创造更大的经济产出。企业的“企”字似乎就在提醒我们时刻不要忘记对经济利润的企图与期望。

（二）权力

把权力列为管理的第二视角，相信也不会引起较大的反对。自从人类脱离原始社会的劳作状态以来，就始终与权力不离不弃。这一状况随着群居生活、团队合作的兴盛而与管理的关系日趋笃密。我们说一个管理者要具有管理的欲望，那么这种欲望就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权力欲”。它可以简单得是对别人“发号施令”的心理状态，也可以复杂得是构造一个相互制约的体系，从而使客观事务能够得到更平稳运行的诉求。

（三）和谐

对把和谐列为管理的第三视角，可能有的人不会理解——本人也相信它会和后面将要提出的第四点“互动”引起较为广泛的争议。这是作者一番思索之后做出的判断，现陈述原因如下。某君设立一个企业，接管一个政权，当然他要考虑如何谋得经济上的发展，这也可能源于他的权利欲。但无论是他本人，还是被管理者，抑或善意旁观的第三人，都在潜意识

中希望能够彼此相安无事——当然这只是一个狭隘的方面；如果角度再宏观一些，就应是润滑、融洽的人、财、物、关系等的配置。供应链的管理甚至库存材料的摆放都要依据某种原则以利于紧前或紧后的工序从而使得整体流程无缝、顺畅，其所渗透的即为一种和谐的意向。至于人际之间、人机之间，则更需要和谐的旨念了。企业战略目标的制订，要考虑长短期和谐；内部和谐的同时，也要追求外部和谐……可以说，和谐的理念贯穿于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四）互动

从互动的角度审视管理，看似新鲜，实则有着古老的背景。为什么管理要追求1+1>2的效果？一旦形成了组织，哪怕它只有两个人，但只要有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分，就存在一个如何激发被管理者内在动力的问题。冠冕堂皇、流于形式的所谓“大干快上”、“齐心协力”无助于目标的达成。对牛弹琴，显然没有达到互动的目的；照本宣科，依然不会有期望的行为产生。只有真正明确机理，投其所好、搔其痒处，合力才会形成，企业才会高歌猛进。

四、参照系

因为视角的选取不同，参照系自然也会相异。这里严格基于前文所述的视角继续讨论。

（一）经济

利润是经济学家爱不释手的对象。由利润的视角来透视管理，当然免不了要以经济为参照系。供需决定、价格机制、产量选择、市场判定等等，都是企业在追逐利润时的必修课程。企业在市场中运作，要有自知之明。这个“自知之明”就是要理智地判断所处市场及自身位置；要对产品有着深入的了解——不仅是其规格、功能，各种弹性、成本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等都应是管理者要去关心的。企业还要做到知己知彼，从而能够在与竞争对手的重复博弈中保持优势。

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打交道，还要了解一些宏观经济的情况。国民经济整体的走势如何，消费投资的趋势怎样，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体现出何种前景？企业要在对以上情况的研判中获取与己息息相关的信息，从而能够在市场竞争中更为积极、主动。更重要的是，管理者要在企业实务中自觉养成运用经济理论指导管理实践的习惯。“拍脑门决策”早已过时，它换回的更可能是投资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共赴险境；事态不妙时，“一拍大腿”——“哎呀，怎么会这样？”。而在进一步恶化后，便“拍拍屁股”走人跑路，一走了之。这样的“三拍管理”^①无疑是组织发展的毒药。

（二）政治

权力经常被认为是政治家股掌间的玩物，此言虽诙谐调侃，却也有一定道理。事实上，岂止国家的

民主事务需要政治。

1. 公司政治

公司内部同样少不了政治。我们常见到某企业内拉帮结伙、帮派林立，这就是公司政治内部作用的结果。人难免不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经意间，可能一个人就已经加入了一个内部势力范围。当然我们有企业文化、非正式组织来解释。但是依然有这些所不能解释的，明确地提出来——其实也很正常，权力的划分既然有多寡之别，那么政治的产生也是理所应当。为了制约权力，就产生了分权——联邦分权制和模拟分权制应运而生。分权化原则使不加区分的董事会分成了执行部门（董事会）和非执行部门，即监督部门（监事会）。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②在公司内得到了形似神也似的体现。在中国的党政机关当中还别出心裁地奉献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创新的问责机制。

对生产关系的梳理，在任何时候都要凭借政治这一利器。它可能会面临哲学或管理哲学的问题，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仍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仍是利益分层的自动指针。权力始终是政治的核心焦点，管理者要达到统治的目的，同时还要一定程度上满足非管理者“参与”的要求以实现“民主”——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每每见到某位领导便肃然起敬，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高手才能处理化解这“欲理还乱”的内部纷争。

2. 市场政治

如果说公司内的你争我夺还“犹抱琵琶”的话，那么在同外部的交往过程中公司管理者的“政治家”行为则更为明显：他们以高超的市场谋略来攻击对手，他们懂得借势或造势来吸引眼球，他们甚至会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左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政治家的手法来把握市场，经营企业，这就是市场政治。在作者看来，市场政治是管理者要取得成功的一门必修课。政治有时就像天气一样，如果管理者不懂天气，怎么可能做好企业？关注目前的天气可以把今天过好，但如果没关注明天甚至后天的天气，管理者失去的则可能是企业的未来^⑥。

（三）社会

管理的终极目的应该是提高组织与人的生活质量。但这一目标能否一蹴而就？

1. 和谐社会

当今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词汇莫过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了^③。它体现了党中央高瞻远瞩地看到了发展不应以速度为代价这一命题，这也就给了我们上面问题以否定的答案。体现到管理的视角上，就是追求管理客体与目标的合理搭配。而从和谐的视角来考量管理，更多地是选取了社会作为参照的标准。当今的社会，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存在着太多的所谓“二元”：城

乡二元、工农二元、贫富二元、劳资二元……目标矛盾、利益冲突虽不及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根本，但也是社稷管理者所面对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把社会作为参照系，求得各主体之间、客体之间、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共生，求同存异，从而使共同的利益有更大的发展——这绝对是管理过程中应予考虑的兼容之策。

管理是一种客观职能，取决于其任务；也就是说，管理是一门学科。但管理又受一定社会文化的影响，并从属于其价值观、传统和习惯。管理必须成为一种能使文化上的差异为人类的共同目标服务的工具。欧洲大陆对管理所感到的激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寄希望于管理能改变文化和社会传统，管理的这种能动性带给人类的将是加速实现的更加和谐的社会。

2. 社会责任

管理者必须是一位名匠，他的第一职责就是使他的机构完成其所以存在的使命和目标——不论它是商品或服务、学业或诊疗。但这还不够——每一个机构都是因社会而生，并且存在于社区之中。因而它必然会与外界产生各种摩擦、碰撞与冲击，而它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现代国家多机构的社会中，各个领导集团即各种机构的管理者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必须深入思考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信念和承诺，必须在完成其机构特殊而有限的使命之外，承担起“协调官”的角色。这种责任引起了一种新的重大挑战——并在管理方面和政治理论及实践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困难的问题。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社会责任不能回避。这不仅是由于公众需要、社会需要，而且由于在现代社会中除了管理人员以外，没有其它的领导集团。如果我们的主要机构、特别是工商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为共同的利益而承担起责任来，那就没有其他人能够或将会承担起这个责任了。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揭示了公司不仅应当承担对股东、员工的责任，更应该承担对社会的责任^⑦。这引起通用总裁斯隆的强烈不满^④，然而若干年之后，它却被众人所信服。政府在一个由各种组织组成的多元社会中已经不再能成为“统治者”或“共同利益的守护者”，虽然政治理论仍然认为它还可以做得到。这个社会中的领导集团即关键机构的管理人员，不论他们是否愿意——事实上也不论他们是否胜任——都必须认真考虑他们能够并应该承担些什么责任，在哪些领域并为了什么目标而承担责任。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极端的要求也许是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在六十年代的一项声明中提出的。该市长号召纽约市的每一家大公司“认领”一个黑人贫民区，并保证该贫民区中的人得到生活中的各种必需事物，受到教育，有职业。然后他进一步补充说，他希望这些大公司能保证每一个黑人家庭中有一个男人作为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这种看似蛮不讲理的要求给社会、社区、家庭和我们所称的“弱势群体”带来

的却是安定与和睦。

(四) 系统

本位主义是管理现象中比较常见的问题,表现为个人本位、部门本位、地区本位等。这也是令管理者头痛的问题之一。究其原因,还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互动不够。可能被管理者只站在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其视角必然偏于狭隘。但是如果把他的视野拓宽,即以整个或更大的系统为参照,相信他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北京地区有一个县长曾经这么说:“不是我不支持党中央的决定,但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长,我只能管这么大的地方。所以我要对外来工限制,减小他们对本地人就业用工方面的威胁。如果我是中央总书记,我也会要求各地取消对外来工的限制——但是我不是啊!”可以说,这位县长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群体的心声。

希望相对方有一定的行为产生,必须要给对方以动力。“雷锋出国了”^⑤,这句话说明在商品经济社会仅靠精神层面的维持难以保证组织运作的高效。当然如果认为单靠金钱来给予动力的话,将会是同样狭隘的观点。这就要求把个体放在更为庞大的一个集合(我们可以称之为“系统”)中去考虑问题,考虑先后的问题,考虑整体与局部的问题,考虑利益传导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无非提醒我们要从全局着眼,把握宏观的走向。而于细微之处,则要谨慎于环节的缜密衔接——“君欲取之,必先与之”。利益传导机制如果断链,再响亮的口号也将成为空谈。系统动力学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它仍然在强调系统的观点。

五、分析工具

管理不能也不应该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要把管理应用于实务——活学活用,还必须借用一些方法技术,就像人必须靠四肢才可以行走天下、纵横捭阖一样。

(一) 经济学分析

有的人曾戏言,(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无非是一般均衡。此言虽有些夸张,但仍具有一定道理。然而建立在一般均衡之上的却是管理者对经济学基础知识扎实的理解。供求决定价格,静态、动态以及结合弹性的分析,生产函数与各种成本的确定,是寻求最优利润的常规武器。边际效用分析、无差异曲线分析以及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影响则将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广。对各种市场结构的了解赋予了管理者“自知之明”。这时一般均衡则将水到渠成地解析所谓的福利经济与市场失灵等。对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及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将有利于管理者对大势的研判。失业也是管理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管理决策的制订、战略的选择、对环境分析

都要很大程度上吸收经济学中的思想。当然,离开数理方法谈利润的确定肯定会是无源之水、无米之炊,而很好的结合体就是管理经济学与管理统计学。

(二) 政治学分析

马克思“世界统一于物质”的观点与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的理论,分别在宏观与微观方面给予了管理者理性的支持。政治权力、政党、政治参与、政治民主甚至人权都几乎与企业管理如出一辙:管理权力、管理机构、参与管理、民主管理以及多样化的人格特征等。其核心的思想还是一种“制衡”的理念。有人讲政治家“勾心斗角”,不无道理。即要形成权力上的牵制,不可出现极化。中国现今努力治理证券市场上的一股独大问题,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管理实务中的授权、分权乃至它的制度化,如会计稽核,都体现了这个思想。组织设计的意识则更可说是源于政治学中官僚机构的设计。而在领导与控制环节中,无不渗透着政治学基于权力的观念。公司在与产业要素(供应方、购买方、潜在加入者、替代品、行业竞争对手)打交道时,兼具商品与政治色彩——强化己方权力应是其心照不宣的一个行事宗旨。

(三) 社会学分析

如果说政治学对权力的观点是“制衡”的话,那么社会学对和谐的观点则是“平衡”。前者强调互相牵制以限制权力的无限膨胀,而后者则注重经斟酌之后格局的合理搭配——体现了善意、公平的思想。最为典型的生产物料计划,除有其科学的一面外,再有的就是这种和谐的思想。而这在计划的其他领域也是亦然的。换句话说,我们考察一个计划是否合格,就可以把它所分配的各个环节拆开来,如果和谐布置、彼此相安无事的话,那么不失为一个好计划。如果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则只能说这是一个“混水摸鱼”的计划。“平衡”并非只在计划环节得到适用。如决策环节中个体决策与群体决策的选取,组织环节中组织结构的配置,应对变革时的创新,都要把“平衡”作为考量依据。

(四) 系统学分析

为达到“互动”或“他动”的目的,把管理对象放在系统内考察,“系统动力学”就成为了此时的分析工具。反映到管理学术语上来,就成了“激励”二字。对冲突的处理,纠偏的控制措施,都要应用系统动力机理,甚至因此而形成了管理领域著名的系统学派。在人力资源管理实务中,“互动”的初衷就须诉诸动力才能实现——依此原则所制定的激励措施才会做到有的放矢。而企业与外部的“互动”,仍须在这方面入手。我们这里所谈的激励并非仅限于企业内部的人员激励,它应该是面对内外部的全方位的感召——依旧是系统观念!

(五) 分析仅是工具

需要提出的是,像绝大多数论述管理的书所阐述

的那样——迷恋于分析工具是一种技术主义的态度，而且很快就会退化为官僚主义。而且，可怕之处在于它甚至是贫乏的技术主义。技术主义观念在管理中的不适当可以用通用汽车公司的例子来最好地予以说明。从技术主义方面，即从公司成就方面来说，通用汽车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无论在市场上所占的地位、利润或生产率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却在公众舆论、政治和社会评价方面遭受了严重的失败。通用汽车公司不但没获得作为技术主义成就的报偿，即未获得作为企业管理者的成果，反倒被迫处于防御地位。

六、气象万千的管理视角

德鲁克讲道：“管理是一种职能的履行，犹如器官代机构行为一样。”我们知道手是人最为灵活的器官——它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形状，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任务。这就给我们考察管理以及它的手——管理分析工具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严格地说，每个人的视角都不会相同，至于参照系与分析工具就更不会一致。或许这也是管理学科百花齐放的原因之一。作者才疏学浅，在这里抛砖引玉，但愿不是盲人摸象。

注释：

①“三拍管理”是民营企业极易采取的管理模式。

② 三权分立原则是一个政治学说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相互独立、互相制衡。

③ 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所提出的重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

④ 因《公司的概念》一书，德鲁克与斯隆的矛盾被公开，并在此后长期存在。

⑤ 意指雷锋精神，即友爱互助的精神不见了。

参考文献：

- [1] 彼得·F·德鲁克.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M]. 孙耀君，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4.
- [2] 彼得·F·德鲁克. 有效的管理者[M]. 吴军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8.
- [3] 赫伯特·西蒙. 管理行为[M]. 杨砾，韩春立，徐立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16.
- [4] 爱迪思. 企业生命周期[M]. 赵睿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
- [5] C·I·巴纳德. 经理人员的职能[M]. 孙耀君，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69.
- [6] 彼得·F·德鲁克. 公司的概念[M]. 罗汉，焦艳，王锐，徐正秋，潘益兴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83.
- [7] 姜汝祥. 温水中的青蛙：从市场政治家到战略管理者[J]. 现代商贸工业，2003，(10)：24-25.

[责任编辑：孔康伟]

Prospective, Reference Systems & Analyzing Tools of Management Studies

SUN Bo¹ TAN Li-wen²

(1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Jiaying College, Meizhou 514015, China)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holds that first, economic basis decides upper structure, so profit is often listed the first angle of view in practice. Management pursues effect of $1+1>2$, which implies a kind of interactive angle of view. And economics is unavoidably necessary as a reference system when decomposing management from profit perspective. Second, power takes the form of corporate politics and market politics penetrating the commercial domain. The so-called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suggests that management be studied from harmonious point of view and take society as the referring standard most of the time. Third, the self-concept is a management phenomenon contradictory with interaction. To deal with the contradiction, it requires taking the entire or a larger system as reference, namely systematic view. Fourth, as far as the analyzing tool is concerned, economic analysis basing on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is an important and regular one. In management practice, as power diversion is a must, and polarization should be forbidden, management should resort to political analysis to assist. Finally, to achieve the aim of ‘interactive’ or ‘proactive’, management object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the viewpoint of the whole system. Thus, ‘system dynamics’ becomes the analyzing tool.

Key words management; angle of view; reference system; analyzing tool